

文艺学大视野丛书

杨守森 著

# 穿过历史的烟云

—— 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

花城出版社

文艺学大视野丛书

杨守森 著

# 穿过历史的烟云

—— 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



\*200026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过历史的烟云: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杨守森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4

ISBN 7-5360-3311-7

I. 穿… II. 杨…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3430 号

穿过历史的烟云

——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

杨守森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插页 210,000字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3311-7

I·2750 定价:13.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出版前言

往事如烟。

20世纪的大门正在缓缓关闭，我们即将迈进21世纪的门槛，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世纪。仅以文学艺术而论，其辉煌成就，毋庸置疑。但历史的进程，也伴随着浮泛的喧嚣，迷乱的骚动，本体的困惑，艰难的抗争。总结历史，展望未来，当是文学艺术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于是有了这套“文艺学大视野丛书”。

该套丛书，是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学科承担的教育部立项的“九五”社科规划课题，也是该学科“九五”期间的重点科研工程。它以开放的理论视野与新颖的文化眼光，以勇于思考的求索精神与批判锐气，对许多方面的重大文艺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它涵盖古今，包容中外，既有对中国传统文艺观的重构，又有对西方诗学道路的审视；既有关于中国文艺学历程的反思，又有关于21世纪文艺学走向的探寻；既有对经典学说的当代阐释，也有关于重要理论范畴的新解。以如此宏阔的学术视野审视文艺学的过去和未来，是这套“文艺学大视野丛书”的旨趣之所在，也是“大视野”之为“大视野”的由来。

我们于世纪之交推出这套丛书，把它作为献给21世纪的

一份礼物，以求为推动中国文艺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尽绵薄之力。

花城出版社

2000年3月18日

EK99/21

## 自序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20世纪的中国，必将越来越成为各个领域探讨的专门课题。关于文学艺术的研究，也必会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在这方面，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不应像以往那样，更侧重于为历史评功排好，或对某些文学现象、某些文学观念、某些作家作品，予以简单化的批判否定，而应切实地总结百年文学史上的教训，以为“后事之师”。

我们自然不能低估20世纪中国文学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五四”时代，一大批激奋昂扬，大呼猛进的诗人、作家，虽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工具理性”的制约，但毕竟以其如火如荼的生命激情，一扫封建社会末期中国文坛的低迷与颓唐，揭开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篇章。此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一直不乏头脑清醒，坚守自我，有胆有识，执着于文学事业的英才俊杰；不乏深为读者喜爱，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但已有的成就，与交织着血雨腥风，翻腾着狂飚巨澜，蕴藏着丰厚文学资源的百年历程相比，与我们这个泱泱东方大国相比，还是极不相称的。

我们虽然可以举出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胡风、徐志摩、张爱玲等这样一大批卓有贡献的诗人、作家，但从更高的要求来看，独出机轴、精雕细刻、意蕴深厚、形象丰满、大气磅礴、震撼千古的民族心灵史

诗毕竟不多；亦少见文化素养丰厚、笔力高超、卓然不凡，堪与罗曼·罗兰、海明威、卡夫卡相匹敌的世界一流文学大师。

其中，既与创作主体在人格素质、文化视野、艺术修养等方面的某些局限有关，更是由于受到了某些偏狭的文学观念、错误的文学策略、僵死的文学机制束缚的结果。事实证明，不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度，如果戒律迭加，禁忌丛生，或人格萎缩，自我压抑，都会窒息创作主体的生命活力。当然，如果放任自流，完全听凭主体本能意志的泛滥，则又很可能会危及社会，甚至可能导致文学艺术本身的毁灭。而相比而言，中国百年文学受到的侵害，主要在于前者而不是后者。

在我国 20 世纪初期爆发的那场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虽以反叛封建礼教，张扬自我，个性自由为旗帜，但与民族解放、重建国家秩序的时代要求相关，工具理性却一直占据了全社会文化意识的主导地位。在文学方面，虽然有过挣脱“文以载道”传统的抗争，实际上却未能走出“载道”的误区。特别是在后来的革命战争年代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文学“为政治服务”乃至“为政策服务”，曾长期被视为文学创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这固然表现了历史对文学事业的器重，使之有过跃身于时代激流的荣耀，但也常常因其极端化强调而压抑了作家的生命个性，导致了文学作品的枯燥化、概念化之类弊端，甚至酿成了一次次的文坛灾难，以及众多诗人、作家的人生悲剧。

对此，只有予以冷静科学地深入探讨，才能有利于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但在我们已有的关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更多见到的则是：或自得于历史的成就，陶醉于良好的自我感觉；或固守简单化的阶级性、政治性视角，武断地排斥了许多具有相当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而对于真正影响了文学发

展的某些弊端，则反思不足，批判不足。我们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历史的过失，但更重要的显然是要以冷静科学的态度，予以真正实事求是的深入探讨。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总结经验，促使中国的文学水平更快地提高。

鉴于此，本书这儿是专就问题立论的，主要涉及以下 10 个方面：1.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存在着三大痼疾：工具化与运动文学、歌颂化与暴露禁忌、理性化与泯灭自我，致使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误入歧途，虚耗了自己的文学生命；2. 长期盛行的“极左”思潮，导致了文学观念的日渐偏狭，文化资源的日渐匮乏，作家心态的重重禁忌，严重地破坏了中国文学的生态；3. 对传统人道主义的片面批判，以及现代人道主义（即生态伦理意识）的贫乏，导致了文学意蕴的浅显；4. 由于独尊现实主义，导致了文学流派的孤寂；由于“伪现实主义”大行其道，导致了“瞒”“骗”之作的盛行；5. 由于生搬硬套、简单模仿以非理性为哲学基础的外来各种主义，而陷入了新的文化迷途；6. 文学的“第一要素”（语言）被搁置，文学的母语个性被忽视；7. 由于学术人格的退化、病变与缺失，导致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成就低下；8. 中国的文学批评界，由于长期奉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之类原则，致使形成了理论向度单一、批评视角二极对立之类缺陷；9. 中国的诗人、作家，往往心灵萎缩，文化结构简单，底气不足，缺乏艺术的殉道精神；10. 中国的文艺领导与管理体制中，由于政治戒律森严，行政干预严重，压抑了作家的艺术才华，窒息了创作生机。

由于各种复杂原因，自知所论尚嫌肤浅。且对于中国的百年文学历程而言，触及的也还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另有许多诸如“自由主义思潮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民族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殖民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政党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等重要问题，尚未来得及探讨，这只能有待于日后的继续努力了。

2000 年 3 月 16 日

于山东师范大学

# 目 录

|                      |        |
|----------------------|--------|
| 自序 .....             | ( 1 )  |
| 第一章 创作痼疾与本体迷失 .....  | ( 1 )  |
| 一 工具化与运动文学 .....     | ( 1 )  |
| 二 歌颂化与暴露禁忌 .....     | ( 9 )  |
| 三 理性化与泯灭自我 .....     | ( 19 ) |
| 四 文学本体的自卫机制 .....    | ( 25 ) |
| 五 冷静科学地面对历史 .....    | ( 27 ) |
| 第二章 极左”思潮与历史重负 ..... | ( 32 ) |
| 一 “左风”之历史扫描 .....    | ( 32 ) |
| 二 日渐恶化的文学生态 .....    | ( 39 ) |
| 三 “左风”探源 .....       | ( 50 ) |
| 四 挣脱历史的重负 .....      | ( 57 ) |
| 第三章 人道主义与生态伦理 .....  | ( 62 ) |
| 一 由潮涌而至潜流 .....      | ( 63 ) |
| 二 由压抑而至抗争 .....      | ( 67 ) |
| 三 人道主义与文学艺术 .....    | ( 73 ) |
| 四 传统人道主义的批判 .....    | ( 77 ) |

|     |                  |       |
|-----|------------------|-------|
| 五   | 新世纪文学的人道精神 ..... | (82)  |
| 第四章 | 现实主义与一元格局 .....  | (88)  |
| 一   | 君临一切的创作原则 .....  | (88)  |
| 二   | 独尊现实主义的格局 .....  | (94)  |
| 三   | “伪现实主义”的盛行 ..... | (100) |
| 四   | 现实主义与马恩学说 .....  | (106) |
| 五   | 魅力永存的现实主义 .....  | (111) |
| 第五章 | 主义泛滥与文化迷途 .....  | (114) |
| 一   | 自我个性的无限膨胀 .....  | (114) |
| 二   | 创造能力低下的悲哀 .....  | (119) |
| 三   | 哲学尴尬与艺术困境 .....  | (125) |
| 四   | 理性建设与文学发展 .....  | (130) |
| 第六章 | 自炫色彩与母语个性 .....  | (136) |
| 一   | 被悬置的“第一要素” ..... | (137) |
| 二   | 文学语言的自炫品性 .....  | (141) |
| 三   | 文学语言陷入的误区 .....  | (145) |
| 四   | 新时期的文学语言景观 ..... | (153) |
| 第七章 | 学术人格与主体建构 .....  | (162) |
| 一   | 学术人格的体现 .....    | (163) |
| 二   | 学术人格的退化 .....    | (168) |
| 三   | 学术人格的病变 .....    | (172) |
| 四   | 学术人格的重建 .....    | (178) |

|      |                  |       |
|------|------------------|-------|
| 第八章  | 理论困境与批评尴尬·····   | (187) |
| 一    | 偏狭拘谨的批评视野·····   | (188) |
| 二    | 理念在前的批评向度·····   | (194) |
| 三    | 二极对立的批评模式·····   | (200) |
| 四    | 机械呆板的批评文体·····   | (208) |
| 五    | 确立真正的批评精神·····   | (211) |
| 第九章  | 创作主体与人格缺失·····   | (216) |
| 一    | 主体心灵的萎缩·····     | (216) |
| 二    | 文化眼光的屏蔽·····     | (228) |
| 三    | 殉道精神的匮乏·····     | (233) |
| 四    | 作家人格的自塑·····     | (238) |
| 第十章  | 文艺领导与管理体制·····   | (245) |
| 一    | 难以实施的“双百方针”····· | (246) |
| 二    | 强求一律与外来干预·····   | (255) |
| 三    | 计划模式与文艺体制·····   | (263) |
| 四    | 文艺发展与体制改革·····   | (267) |
| 余论   | 文化心态的解放·····     | (270) |
| 参考文献 | ·····            | (275) |

## 第一章 创作痼疾与本体迷失

对于中国人来说，20 世纪，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灾难奋勇前进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许多善良正直、向往自由的中国诗人、作家，呐喊抗争，披肝沥胆，上下求索，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古老民族的振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心血。但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也一直存在着背离艺术规律的工具化与运动文学、歌颂化与暴露禁忌、理性化与泯灭自我这样三大痼疾，严重地抑制了作家的创作才华，束缚了作家的个人想像，导致了文学价值的简约化、创作活动的机械化以及文学本体的迷失，制约了文学的成就。

### 一 工具化与运动文学

从源起来看，“文学工具论”，作为一种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密切关联的创作主张，基本上是与 20 世纪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相伴而生的，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在新时代的延续。中国的文学艺术，历来注重“载道”功能，诸如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刘勰“摛文必在纬军国”（《文心雕龙·程器》）之类，一直是备受推崇的文学主张。反叛“文以载道”的封建传统，本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出发点，但许多现代诗人、作家注重的实际上

仍是文学改造社会的功利价值。尤其是在自 1928 年春到 1930 年初中国文坛上爆发的那场关于“革命文学”的大论战中，更为明显地形成了新的“载道”观，只不过是“封建之道”置换为“革命之道”而已。正是在这场论战中，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等《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从“革命文学”观出发，强调“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我们的作家是“为革命而文学”而不是“为文学而革命”；我们的作品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学家与战士，笔与迫击炮，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王独清《文艺上之反对派种种》）。曾经宣称“只想当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反对文艺功利目的的郭沫若，这时也发出了另外一种反叛了自我的声音：“文艺是生活战斗的表现”，一位文艺家“只有冲锋前进，没有低徊。他只有手榴弹，没有绣花针。他只有流血，没有眼泪”（《桌子的跳舞》）。这些理论家的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是令人敬重的，但这类主张，自然只能导致文学作品本身的工具化。

对此，茅盾在 1928 年发表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曾经较早给予了正确的批评：“有革命热情而忽略于文艺的本质，或把文艺也视为宣传工具……因而也就发生了可痛心的现象：被许为最有革命性的作品却正是并不反对革命文艺的人们所叹息摇头了。”而对于这样的不同意见，“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当然是不能接受的，钱杏邨辩称，无产阶级文学就是要叫喊，要高呼，它离不开标语口号。“在革命的现阶段，标语口号文学在事实上还不是没有作用的，这种文学对于革命的前途是比任何种类的文艺更具有力量的。”“普罗文学不是普罗的消闲艺术，是一种斗争的艺术，是一种斗争的利器！它是有它的政治的使命！创作的内容是必然的要适应于政治的宣传的口号

与鼓动的口号的!”<sup>①</sup>正是根据这样的文学主张,对于“我们的光明,/只有红的一线,/在世界那头浮涌。/去,快向那红的一线上冲!/我北方的民众,南方的民众”这样一类空洞叫喊的口号诗,有的评论家竟给予了不切实际的高度赞赏,认为“我们的未来,希望生命的喜悦,尽在这数行里面。……能够赞美未来的只有我们的诗人。而且,这篇诗的沉雄的气息又是超越技巧的技巧”。<sup>②</sup>

“左联”成立之后,在具体的文学活动中,不仅仍以“工具论”为主旨,而且进一步发展到了否定文学存在的程度。“左联”本来是一个文艺组织,实质上却成了一个政治团体,正如周扬在晚年的回忆中所说的:“当年的‘左联’成了第二党。为什么叫第二党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跟党一样的。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却专门谈政治”。<sup>③</sup>事实正是如此,当时的“左联”领导人,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文学艺术活动中,而是热衷于组织发动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鼓动工人罢工等各种激进的政治活动。相反,谁要是热心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就被说成是“作品主义”;谁要是热心想做作家,就被说成是“作家主义”,就会被视为“右倾”。茅盾只因告假半年写《子夜》,即在“左联”会议上遭到许多人的攻击;郁达夫也因曾对徐志摩说过“我是个作家,不是个战士”之类的话,因不愿参加散发传单之类形式主义、盲动主义

---

① 《“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30、831页。

② 冯乃超:《冷静的头脑》,《“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561页。

③ 《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2期。

的政治活动，而被视为“投机和反动分子”，遭到“左联”除名。

后来，虽有不少人仍在坚持或提出与“工具论”不一致的看法，如徐志摩力倡注重形式的“新唯美主义”；李金发崇尚神秘意味的象征主义；梁实秋进一步强调“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沈从文则提出了“美在生命”的命题；胡秋原则主张“无论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自然主义文学，趣味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最近民主文学，我觉得都不妨让他存在，但也不主张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而谁能以最适当的形式，表现最生动的题材，较最能深入事象，最能认识现实把握时代精神之核心者，就是最优秀的作家”（《勿侵略文艺》）。所有这些，对于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而言，分明是有其真理性的，但却不是被冷落，就是遭到了来自革命文艺阵营的痛斥。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之后，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文学工具论”，更是日渐成为至高无上的创作原则，神圣不可冒犯的信条。

建国之后，缘其历史的惯性及稳固新生政权的需要，这种背离艺术规律的工具化追求被进一步强化，由“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斗争服务”进而缩小为“为政策”或为某一“具体任务”服务。1949年7月，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即明确宣布：作家要“将政策作为他观察描写生活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一个文艺工作者，只有站在正确的政策观点上，才能从反映各个人物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生活

行为和思想动态、他们的命运中，反映出整个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斗争、各个阶级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各个阶级的命运。……一个文艺工作者，也只有站在正确的政策观点上，才能使自己避免单从偶然的感想、印象或者个人的趣味来摄取生活中的某些片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生活作歪曲的描写”（《新的人民的文艺》）。随后，茅盾、邵荃麟等人对此进一步作了阐发。当年曾经反对过“文艺工具观”的茅盾，这时也强调：“如何能使一篇作品完成政治任务而又有高度的艺术性，这是所有的写作者注意追求的问题。如果追求到了，就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如果两者不能得兼，那么，与其牺牲了政治任务，毋宁在艺术性上差一些。”<sup>①</sup>邵荃麟分析说：“通过文艺扩大这些政策的宣传和教育，这在发展和加强当前文艺运动上，应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政治的具体表现就是政策，作家不能在创作上善于掌握政策关系，也就不能很好地为政治服务。”“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时时刻刻地把他的写作作为一种宣传教育工作。这样的赶任务是完全应该的。”<sup>②</sup>建国后前17年的文学，正是以这样一种服务于政策或某一具体政治任务为宗旨的。影响所及，有时候，甚至诸如灭四害、扫盲、计划生育、大养其猪之类社会任务、生产任务，也往往要求文学艺术予以密切配合。1966年第2期《火花》杂志，发表过这样的社论：《大写“两个一千五百万”》，号召文学艺术“要为建设两个一千五百万亩稳产高产田服务”。试想，在这样的文

---

① 茅盾：《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文艺报》1950年1月25日第1卷第9期。

② 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1950年10月第3卷第1期。